

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孟鑫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工作，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正确处理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些工作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党内外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现象。一些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极少数人夸大党所犯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面对这些思想混乱状况，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指出，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他特别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明确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它推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我们党面临的现实课题和历史使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3年多的时间里，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展开，对外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工作取得进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逐步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召开党的十二大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光辉旗帜。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也遭遇了国内国际诸多挑战。苏东剧变后，中国再次面临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党将这些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进行科学概括，在党的十四大上将其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党的十五大上，进一步将其命名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确立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围绕这个重大问题所进行的探索和解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选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创的重要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根本成就，它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精辟概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其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的发展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各项工作出现徘徊局面。这种现实要求我们党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左”倾错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由于“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禁锢，导致人们对“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等问题产生困扰。1977年4月，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表明了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立场。邓小平在恢复领导职务后，要求我们党通过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走新路、讲新话”。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此文，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明确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这篇文章在全国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尽管文章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正面阐述，实际上却批判了“两个凡是”，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面对真理标准讨论遭受的指责和压力，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这场大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促使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理论基础。同年，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朝鲜、越南、日本、印度、奥地利、波兰、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籍的党员。其中，日籍中共党员群体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曾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来到中国，但被俘后接受了反战教育，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人格魅力影响下，放弃“军国主义”思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自愿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佐藤猛夫就是典型代表。

作为日本军医来到中国战场

佐藤猛夫，1910年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是家中的次子。其父亲是律师，属于日本的中产阶级家庭，家有2个助手、2个打字员和2个女佣。家境优渥的佐藤猛夫从小便接受良好的教育，立志要当一名医生。

后来，佐藤猛夫考入日本知名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打算毕业后成为治疗结核病的专门医生。佐藤猛夫在学生时代是个典型的书呆子，不关心政治，表现懦弱，也不善于社交。

1937年4月，佐藤猛夫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进入同爱会纪念病院工作。如果不是战争，他会安心做个好医生，经营自己的生活。但是，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而改变了佐藤猛夫的人生。日本侵略者妄想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本侵略者的美梦。日本对中国的战争长期化，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补充兵员。1938年的一天，与妻子结婚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以史为鉴”是一以贯之的。中华民族向来重视历史，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因而也就非常重视记述历史。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唯一没有中断的延续下来的文明，与中华民族始终重视历史、重视历史记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史学是文明的载体，史学没有中断，文明就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以史为鉴”的思想因素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典籍《尚书》中就已经出现了。《尚书》是商、周王朝的训诰和追述古代的文献汇编。《尚书·多士》中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朝已经出现了历史典籍。《尚书·召诰》中告诫周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意思是要从夏、殷的灭亡中获得鉴戒。“监”与“鉴”通。“监”的繁体是“監”，其本义是人的眼睛看器皿中盛满的水，即通过静止的水，反照自己，看清自己的模样。《尚书》中表达鉴戒之意，用的都是“监”，如“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予惟不可不监”等。后来有了金属的镜子，于是人们逐渐弃用“监”，而改用“鉴”字。“鉴”的繁体是“鑑”或“鑒”，也就是说，反照的中介由“水”变成了金属，本质上还是观照之物。《诗经·荡》曰：“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在提醒周人要注意殷代灭亡的教训。

中国历史上强盛时期，当政者往往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秦亡汉兴是二三十年内发生的历史巨变。刘邦作为胜利者，他本人都很疑惑，为什么强大的秦朝这么快就土崩瓦解了？为什么在

从日本战俘到中共党员

——佐藤猛夫的反转人生

□ 赵唯一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在进行学习讨论

不到10天的佐藤猛夫被征召入伍。1939年5月，他从日本来到中国青岛，作为中尉军医参加日本的侵华战争。

被俘的经历改变了一生

1939年8月，佐藤猛夫参加了他踏上中国领土后的第一场战役，遭到了惨败。在山东汶上县，他因头部负伤被八路军俘虏。当时的佐藤猛夫，抱着“死也不受当俘虏之耻”的日军训条，只求速死。但是，八路军对俘虏实行优待政策。司令员杨勇对佐藤猛夫说：“我们不杀放下武器的日本兵，我们还会像对待自己人一样对待你们。”佐藤猛夫当时并不理解，曾数次企图逃跑。

当俘虏8个月后，经历了屡次逃跑失败的佐藤猛夫决定先当医生，以便在获取中方信任后再寻找有利条件逃跑或自杀雪耻。1940年，佐藤猛夫进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卫生部野战医院工作。

后来，佐藤猛夫到八路军野战总预备医院当医生。他高超的医术获得了好评，但他依然没有放弃逃

跑计划，还在寻找机会。在一次逃跑失败后，佐藤猛夫发起高烧，昏迷了3天3夜。从那之后，他决定不再逃跑和自杀，而要研究一下如此善待他的八路军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什么？于是，他开始阅读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同时阅读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佐藤猛夫一方面受这些书籍的影响，另一方面亲眼见证和亲身感受到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被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打动，思想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在晋察冀，白求恩的事迹广为流传，白求恩的精神也感动了佐藤猛夫。他准备投入救死扶伤的工作中，提升自己的医学技能，为医疗工作作贡献。在医疗服务中，他接触到众多八路军官兵和中共党员，被他们的崇高追求所感动，进而对中国国情有所了解，对中国的抗战开始认同。他对日本发动的战争性质有了清醒认识，对自己曾经是侵略者的身份有了深刻的悔悟。1942年6月，佐藤猛夫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一年的思想准备和组织的考察，第二年6月，佐藤猛夫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他更加自觉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工作。

以史为鉴：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

□ 周文玖

楚汉战争中军事实力更强大的项羽失败了？他让儒生陆贾为他找到答案，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论述了历代存亡的原因，写了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历史总结对西汉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西汉初年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效地稳固了西汉的社会形势。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原名是《通志》，记述历代君臣事迹。《资治通鉴》的内容有这样的特点，即“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这样的内容和撰述旨趣，使宋神宗大为感动。他为该书写了序，并赐名“资治通鉴”。在序中，神宗对史鉴思想作了进一步阐释：“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出自《易经·大畜》。可见，宋神宗的史鉴思想是对古老的殷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不仅执政者从朝代兴替、历史盛衰的角度强调“以史为鉴”，历代士人也是如此主张。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司马还说：“述往事，思来者。”直至清代的顾炎武，仍然提出：“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励今。”这些论述，都涉及历史、现实、未来的关系。就是说，研究历史是为了了解现在，以更好地认识未来。

“以史为鉴”不仅是必要的，而

且是可行的。因为历史是既往的现实，而现实又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活的、生动不已的，是在时间线上展开的，历史、现实、未来并没有一条截然划开的鸿沟。历史总是在一个个因果链条中变动的。《周易·系辞》说的“彰往而察来”具有充分的逻辑根据。“以史为鉴”已经深入到中国的文化血液中，是最能体现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内容之一。

那么，传统的“以史为鉴”包含哪些内容呢？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可资借鉴的东西自然很多。从古人的论述看，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治世，一是修身。就如刘知幾说的：“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奢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篋，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这里区分“生人”“国家”，意在说明历史对个人修养和国家治理均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总是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一体，修身的目的在于治世。

传统的“以史为鉴”蕴含着对历史的敬重，包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这在《周易》中即有明显的表现。《周易·系辞》中说：“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传统的“以史为鉴”还特别强调民心向背、民众利益。《周易·系辞》：“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

无悔的人生

1943年春，佐藤猛夫担任八路军军野战医院副院长和卫生学校讲师。他不仅是救治伤员的好医生，还为中国培养了许多医护人员，被人尊称为“日本白求恩”。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我来说，在群众需要我的技术的时候，应暂时牺牲自己的愿望，服从大众的利益，这就是革命工作。从此，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战士，将坚信自己的信念勇往直前。我认为我所选择的是一条最为正确的道路。”

1944年9月，佐藤猛夫来到延安，12月进入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佐藤猛夫认真学习，积极参与讨论，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升。他在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时，认为自己懂得了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无悔的人生”。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佐藤猛夫被允许旁听，他是少数受此殊荣的外国人。

被俘虏的日本兵发生转变的不只佐藤猛夫，而是一个群体。有的甚至掉转枪口，与八路军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成为“日本八路”。日本侵略者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扫荡时，“日本八路”小林清跟八路军战士一起，抗击扫荡的日军，掩护群众。有人感慨地说，八路军是“把我们从日本军部的毒手中拯救出来的恩人”“中共用它正义的教育，使我们懂得了战争的本质，使我们学到了新的人生观和新的希望”。

日本战败后，他们启程回国。周恩来在送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生回国时说：“各位回国，我们没有赠送什么珍贵的礼物，我们送去的，是为建设新日本而发挥作用的青年。”1946年1月，佐藤猛夫随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回国，2月加入日本共产党。回顾在中国的岁月，佐藤猛夫感叹道，“出征”至今，被扔进激流，经受磨练，思想上转变了180度，多少次在死亡线上挣扎，又活了过来，我从心里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这句话对司马迁影响很大，他在史论中反复阐释这个观点：“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也就是说，针对弊端进行变革，判断变革成效的最高标准是老百姓是否得到好处。

对于如何“以史为鉴”，我们的先人也有很好的论述。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絜乎？”“絜”与“混”通，混淆的意思。这就是说，生活在当今社会，之所以记述古代的道理，为的是以历史为镜子对照自己，不是要以今法古。治世者需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以成就功业作为原则，怎可古今混淆不分？申而言之：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但不宜简单地照搬。王夫之的论述更加具体深入，他说：“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为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意思是成功值得借鉴，失败也值得借鉴，相同的经历可以借鉴，不同的经历也可以借鉴。历史不过是一面镜子，关键是治世者从此镜中用心悟出道理，取得教益。

“以史为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也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它依然富有生命力，依然是我们获得不竭智慧的重要源泉。

